

1

ANCIENT PHILOSOPHY

第一卷·古代哲学

ANTHONY KENNY

[英]安东尼·肯尼 著

王柯平 译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牛津西方哲学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牛津西方哲学史

第一卷·古代哲学

ANTHONY KENNY

〔英〕安东尼·肯尼 著

王柯平 译

© Anthony Kenny 2004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cient Philosophy-Vol 1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权，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7-176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西方哲学史. 第1卷, 古代哲学 / (英) 肯尼
(Kenny, A.) 著; 王柯平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0.6
(史家名著书系)
ISBN 978-7-5463-3092-1

I. ①牛… II. ①肯… ②王… III. ①哲学史 - 西方
国家②哲学史 - 西方国家 - 古代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5026号

书 名：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古代哲学
著 者：[英]安东尼·肯尼
译 者：王柯平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划编辑：赵国强
责任编辑：宋 春
装帧设计：未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29.5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92-1
定 价：58.00元

书号(全四卷)：ISBN 978-7-5463-3096-9

总 定 价：2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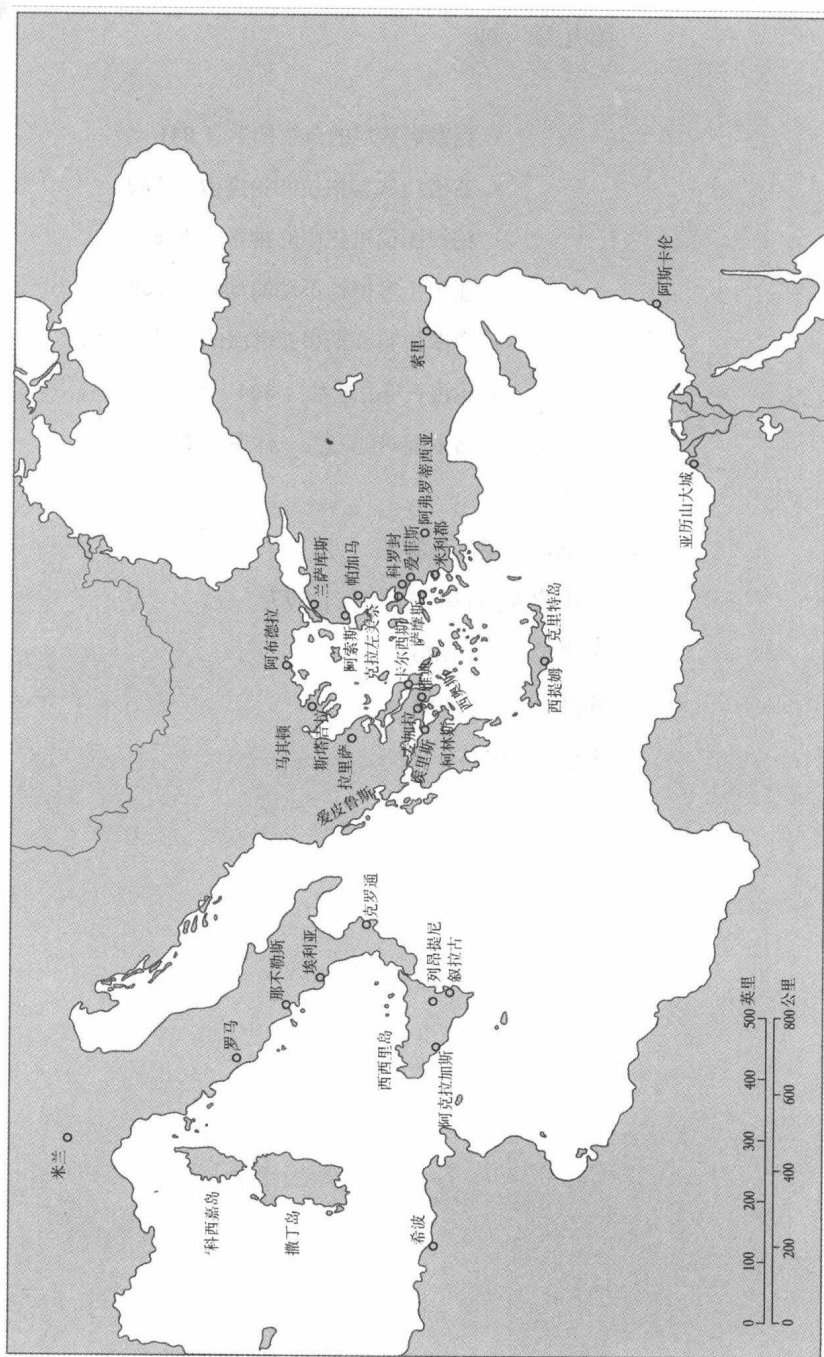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RISE OF MODERN PHILOSOPHY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者前言

近大半年来,我放下原定的写作计划,倾力翻译安东尼爵士肯尼教授(Sir Anthony John Patrick Kenny)的近作《古代哲学》(*Ancient Philosophy*)。不消说,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个甚为紧张但收获颇丰的研习过程。此过程不仅限于审视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流变,而且涉及了解本书作者的学术经历与运思方式。按照本人以往的习惯,每次译稿或书稿交出后,我总会撰写一篇长短不一的前言或后记,仅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些东西唠叨一番,借机表明自己的某些感受或看法。本篇前言将先从作者其人其事谈起,随后简论本书的基本特点以及翻译此书的点滴体会。

一 作者其人其事

我对本书作者相关情况的了解,除了依据互联网上或百科全书里提供的资料之外,主要参考的是作者自传《从罗马启程》(*A Path from Rome*)一书。我之所以关

注他早年的经历,是因为这对他本人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知道,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总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有一定关系,这也可以说是“个性化原则”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安东尼·肯尼于1931年出生在英国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家庭,其母亲一系笃信天主教,其父是一名工程师,从事海上运输,“二战”爆发后被招募从军,授衔中尉,于1940年以身殉国。肯尼自幼在外婆家生活,最早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舅父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Jones)。琼斯是从罗马天主教英吉利神学院毕业后返回英国的神甫,接受过良好的古典人文教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神学家和研究翻译《圣经》的学者。1933年,肯尼两岁半,随家人一起来到罗马,出席琼斯在罗马教廷的神甫授职仪式。仪式之后,在拜谒教皇庇护十一世时,被放在琼斯一位同事房间的小肯尼,因看到身穿黑色袍服的母亲而受惊吓,号啕大哭,引起教皇注意。待家人将他抱给教皇看时,小肯尼相当安静,教皇还问起其年龄。少年时期,肯尼对此事深感好奇,时常揣测其中缘由。

从童年到少年时期,外婆不许肯尼与邻里的同伴在大街上一起玩耍,致使他甚感孤独而少言寡欢,但却充满神性遐想,时感耶稣在其心中,相信神谕所示,臆想自己早逝。“二战”爆发后,肯尼就读于天主教文法学校,为躲避敌机轰炸,上学时间缩短,家庭作业加大,他借机掌握了拉丁文的词性变化与时态变位。194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就读于利物浦天主教区的阿普霍兰德神学院(Upholland College)。他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像舅父琼斯那样博学多识的神甫。

值得一提的是,阿普霍兰德神学院的教师大多从剑桥大学毕业,课程设置内容是以拉丁文为主导的人文学科,初级教育分为7个等级,分别为 Underflow (相当于初级班), Low Figures (相当于中级班), High Figures (相当于高级班), Grammar (语法班), Syntax (句法班), Poetry (诗歌班) 与 Rhetoric (修辞班)。高级阶段主修哲学与神学。每学期的考试成绩在全校大会上公布,每门

学科的成绩都予以排名,由院长用拉丁文从高分到低分连同学生名字一起宣读。宣布分数时,每个班级要轮流站在会场前列,宣读排名分数与个人名字后,学生逐个返回自己原来的座位。凡是成绩不合格者,不宣读其分数与姓名,但要他们站在会场前列,不得返回原座,会后方可离开。这显然是一种无言的惩罚和羞辱。即便在这样严苛的教育体系下,每个年级的众多学生中也仅有一名合乎神甫资格要求,其培养成本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要花去 3 万英镑,而当时一名从教神甫的年薪仅为 30 英镑。

在阿普霍兰德神学院,肯尼因先前学过拉丁文而跳过初级班。在他就读的六年(1943—1949)里,自认为前三年甚感无聊、苦恼、想家,后三年从句法班开始,深感有趣、欣然、快乐。因其成绩优异,他在高线班(Higher Line)被推选为审查员(Censor),相当于男班长(Head Boy)。随后,他开始喜欢上古典文学,可借助 Liddell 与 Scott 编纂的古希腊语英解词典,阅读希腊文原著,譬如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Hecuba*),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等。同时,他也喜欢阅读贺拉斯的《颂诗集》(*Odes*),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等。进入诗歌班和修辞班后,他从大量阅读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和拉丁诗篇中得到巨大乐趣,其阅读范围也包括塔西陀(Tacitus)、西塞罗、李维(Livy)等罗马作家或史学家的散文著作。1949 年毕业时,他被选拔保送到位于巴里阿多里德的英吉利神学院(English College in Valladolid)深造六年,其专业课程为哲学和神学。这所神学院是其舅父琼斯神甫的母校,后者一直认为该校是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

英吉利神学院与位于罗马的格里高利大学(The Gregorian University in Rome)同属于梵蒂冈。在这所国际性大学里,教师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天主教会或耶稣会神学院的著名神学家或哲学家,所有教材与讲课语言均用拉丁文。依据传统要求,入校生在未接受神职委任之前,务必取得传道资格的神甫证书,这就需要研修三年哲学,其主要课程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天文学、经

院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等,此外还需研修四年神学。肯尼本人在格里高利大学与英吉利神学院前后研修7年(1949—1955),在研修神学的第四年(1955)时,就已获得神职委任,成为职业神甫。随后,他为了撰写神甫资格论文,遵照主教高德弗雷(Archbishop Godfrey)的安排,在罗马梵蒂冈档案馆研读一年(1956—1957)。因其所选论文题目涉及语言分析和宗教语言,肯尼继而到牛津大学从事分析哲学研究(1957—1959)。其导师包括奥斯汀(John Austin),赖尔(Gilbert Ryle),黑尔(R. M. Hare),斯特罗森(Peter Strawson),休斯(George Hughes)以及维也纳学派最后成员魏斯曼(F. Waismann)等学界名流。

牛津大学特有的自由与深邃的学术环境,确实让肯尼体察到什么是博学而不古板(erudite without being stuffy)的治学氛围。譬如,他的导师之一昆顿(Antony Quinton),虽是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哲学家,但对自己研究领域里的每部论作几乎烂熟于胸,在随时请教或漫谈之际,可顺口直陈相关著述的要点,可为学生节省许多花费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的时间。也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肯尼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切入,对神的存在、信仰的特性与宗教的地位进行了深入反思,由此也加重了自己心存的疑虑,陷入精神与思想上的双重困惑。如他本人所述:

由于缺乏证明上帝存在的有效证据,开始让我出于其他原因而忧心忡忡。当我将实证主义视为影响宗教信仰理性的重大威胁时,我主要关切的是种种宗教断言的意义性而非真理性。当我认为神秘际遇是认识上帝的康庄大道时,我欣然而乐,足以区分出凭借理性去认识上帝的可能性(梵蒂冈会议所宣扬的观念)和凭借逻辑为上帝存在提供有效证据的可能性(我对此说深表疑虑)。然而,我在牛津大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过程中,这种研究虽然驱走了实证主义的幽灵,但同时也消磨掉了我将宗教体

验作为证明自然神学断言合理性之依据的信心。我开始思索(迄今亦然)这个问题,即:如若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据是有效的,那么,信仰上帝能否从理性上予以证明呢?但是,信仰的作用代替不了证据,因为信仰是遵照上帝之言对某种东西的信奉;人们也不能用上帝之言来证明上帝存在。从逻辑上讲,相信上帝存在必然优先于相信神启。^①

虽然肯尼自称通过研究分析哲学使他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困扰,但实际上实证主义的潜在影响依然存在,并且使他从伴随宗教信仰的历史事实出发,转而又对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理性产生了深度疑虑。如他所说:

教会有关信仰的全部说法也同样困扰着我。这种说法认为信仰是某种不可更改的东西,任何对信仰的怀疑,都要像对待诱惑犯罪一样加以抵制。但是,要接受某种东西作为信仰的一个条款,就得接受几个历史事实:因为,该信仰条款一直是由教会界定的,而教会所认可的权威性,是通过耶稣在福音书里的著名言说赋予的;教皇是圣彼得的传人,言说时具有赋予他的权威性。现如今这些历史断言,容易受到历史进步与《圣经》诠释的影响,其中许多东西遭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大力反驳。如何才能赋予这些断言那种不可更改的、让我们必须信奉的义务责任呢?假如这些“信仰的前奏”无法成为不可更改的赞同意见的对象,那么,有赖于这些前奏或断言的信仰怎么能是不可更改的呢?^②

肯尼在1959年夏季离开牛津大学时,虽然学术收获颇巨,交往朋友更多,但第二篇博士论文进展甚微(后来得以完成并于1980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① Anthony Kenny, *A Path from R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7.

② Anthony Kenny, *A Path from Rome*, p. 148.

牛津西方哲学史
第一卷

对宗教学说的困惑日益增多,心态变得更为沮丧且动荡不安。基于种种信仰疑虑与哲学思索,他在饱受精神性和思想性双重煎熬的同时,也经历了宗教态度的深刻变化。此后,他在利物浦教区从事神甫工作的四年(1959—1963)里,先后应邀在利物浦大学担任临时哲学讲师,在曼彻斯特大学开设系列讲座,并于1961年在牛津大学圣贝内特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随着他对宗教信仰的疑虑日益加深,对学术生活的兴趣日益增大,结果与教会对他的期待也就愈行愈远。最终,他决定放弃神甫职位,实现还俗意愿。经过与家人和教会的商议,他于1963年1月正式提出还俗申请,于1963年12月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恩准。同年12月29日,肯尼收到两份邀请,一份请他到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与三一学院(Trinity)担任两院合用讲师,一份请他到牛津大学堡里奥学院(Balliol)担任研究员(即学院院士)。1964年,肯尼来到牛津,先在另外两个学院执教两个学期之后,随即进入堡里奥学院,先任研究员职,继而任副教授、教授与院长等职,在此一直工作到2001年退休。

在牛津度过大半生的肯尼,曾应邀到英美十余所学院与大学讲学并任教,曾先后担任过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大英图书馆馆长,牛津大学副校长,英国科学院院士、副主席与主席等职。鉴于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与公共事务方面的杰出成就,英国女王于1992年授予其爵士(Knight Bachelor)封号。至此,人们依照传统习惯,尊称其为安东尼爵士(Sir Anthony)。2006年10月,美国天主教哲学协会授予安东尼爵士阿奎那奖章,以表彰他对哲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肯尼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从出版首部著作《行动,情感与意志》(*Action, Emotion and Will*, 1963)以来,相继出版的主要论著包括《笛卡尔》(*Descartes*, 1968),《五种方式:圣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The Five Ways: St Thomas Aquina's Proofs of God's Existence*, 1969),《心灵的本性》(*The Nature of Mind*, 1972),《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73),《灵魂的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Soul*, 1974),《意志,自由与权力》(*Will, Freedom and Power*, 1975),《亚里士

多德伦理学》(*The Aristotelian Ethics*, 1978),《自由意志与责任》(*Freewill and Responsibility*, 1978),《哲学家的上帝》(*The God of the Philosophers*, 1980),《阿奎那》(*Aquinas*, 1980),《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983),《心灵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Mind*, 1989),《何为信仰:宗教哲学论集》(*What is Faith?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992),《亚里士多德论完善的人生》(*Aristotle on Perfect Life*, 1993),《阿奎那论心灵》(*Aquinas on Mind*, 1993),《弗雷格:现代分析哲学创立者导论》(*Fre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under of Modern Analytic Philosophy*, 1995),《西方哲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97),《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论集》(*Essays o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2001),《阿奎那论存在》(*Aquinas on Being*, 2002),《古代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一卷》(*Ancient Philosoph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1, 2004),《中世纪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二卷》(*Medieval Philosoph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2, 2005),《未知的上帝:不可知论集》(*The Unknown God: Agnostic Essays*, 2005),《我相信什么》(*What I Believe*, 2006),《近代哲学的兴起: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The Rise of Modern Philosoph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3, 2006),《生命,自由及功利追求》(*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Utility*, 2006),《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四卷》(*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World: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4, 2007),等等。

肯尼还撰写过另一部自传,题为《牛津的生活》(*Life in Oxford*, 1997)。我迄今尚未读过此书,相信其中一定记载着许多关于他在牛津大学执教的有趣经历与诸多感受。仅就我所阅读过的肯尼自传《从罗马启程》而言,他早年的诸多经历均给我留下殊深的印象。

譬如,他早年接受的古典学术训练,获得的教育机遇和优越条件,确是一般人文学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特权”。当然,也正是这样的教育经历和学术背

景,造就了肯尼这样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如果说哲学史家要真正兼通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话,那么,他的学养、视野与著述,足以表明他本人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就我所知,西方哲学史家们通常会被古代哲学或中世纪哲学这两个阶段卡住,而肯尼对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等思想家的深入研究,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处理这两个时期的哲学发展流变,从而撰写出一部富有自己研究心得的西方哲学通史。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套四卷本哲学史,便是明证。

再如,肯尼的学术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这从他早年翻译《新约全书》的经历中可见一斑。那位对他自幼影响甚大的舅父亚历山大·琼斯神甫,曾受天主教会之托,组织人力重译《圣经》,从1956年开始,到1966年出版,前后用了十年工夫。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部新版《圣经》后来受到广泛好评,主要通用于以英语主持弥撒仪式的各大天主教堂。在琼斯组织重译《圣经》时,肯尼应邀参与翻译《罗马书》等部分。在参阅其他译本时,他发现“几乎每一行译文都会涉及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宗教改革时代不是引起口诛笔伐,就是引起流血争端。谨以希腊词‘*dikaiosyne*’及其同源词为例;钦定译本^①将其译为‘*righteousness*’(正直),杜埃版译本^②将其译为‘*justice*’(正义)”^③。如此一来,圣经学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赞同前一种译法者,坚持认为该词意指个人道德品质,而非社会伦理;而推举后一种译法者,坚持认为该词含义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引申而来,具有重要的出处。这些看似纯粹语言学上的考虑,总是笼罩在不同教派的思索和论证的阴影之下。因此,在翻译《罗马书》时,每一行几乎都要进行决断,采取某种与宗教改革过程中的争论相关的立

① 基督教《圣经》的钦定英译本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1年颁发,通常称其为 Authorised Version,亦称 King James Version。

② 杜埃版英译本《圣经》由英国天主教学者根据《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译出,1610年在法国杜埃(昔为 Douay, 今为 Douai)出版,故称 Douai Version。

③ Anthony Kenny, *A Path from Rome*, p. 118.

场。按规定,新版《圣经》从希腊原文翻译,译稿要呈送文学编辑和圣经编辑审阅。当时,肯尼将《罗马书》译文首先送交一位天主教本笃会的诗人西尔维斯特(Sylvester Houédard O. S. B)修改。后来他发现,这位诗人对每一行译文都倾力修改,甚至不惜把原译文改得“面目全非”(drastic revision)。这里不妨列出两段译文以作比较。前一段译文是年轻时的肯尼所为——

You may bear the name of Jew, you may trust in the Law, and boast of God. With the help of the Law, you may know his will and tell what is right. You may pride yourself on being a guide to the blind, a light to those in darkness, a teacher to the ignorant and an instructor for the unlearned, because you possess in the Law the embodiment of knowledge and of truth. If so, then why do you not teach yourself as well as others? Why, when you preach against stealing, do you steal? Why, when you forbid adultery, do you commit adultery? Why, when you abhor idols, do you rob their temples? When you boast about the Law, and then disobey the Law, you bring God himself into contempt. ①

后一段修改润色之后的译文是那位诗人与《圣经》编辑所为——

If you call yourself a Jew, if you really trust in the Law and are proud of your God, if you know God's will through the Law and can tell what is right, if you

① 根据国内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辑出版的中英对照本新标准修订版《圣经》,这段文字汉译为:“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法玷辱神吗?”(《新约全书·罗马书》,2, 17-21)。

are convinced you can guide the blind and be a beacon to those in the dark, if you can teach the ignorant and instruct the unlearned because your Law embodies all knowledge and truth, then why not teach yourself as well as the others? You preach against stealing, yet you steal; you forbid adultery, yet you commit adultery; you despise idols, yet you rob their temples. By boasting about the law and then disobeying it, you bring God into contempt.

肯尼在自传中坦言,他初阅修订后的译文时,发觉改动过大,内心颇感愤懑。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以公正无偏的态度重读此文,发现后者委实高于前者,对自己原来译文确有改进。就我个人阅读的直观感觉而言,前一段译文估计是紧扣原文而为,故文笔平实坦直,语流节奏和缓,意群逐句展开。相比之下,后一段译文基于前者的特点,从整体意群出发,用条件句式形成排比,其文风更为简明,节奏更为紧凑,在隐含的一系列追问之中,形成一气呵成之感。

再如,处于上世纪6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肯尼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其独到的省察,即使面临来自教会主流意识的压力,他也不为所动,保持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这对于一个天主教神甫来讲,难能可贵。肯尼反对战争,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杀戮,反对制造和使用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坚持认为,任何用不正义对付不正义、用谋杀对付谋杀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他凭借自己的良知,克服重重阻碍,包括来自教会的种种干扰,不断在报刊上或讲演中发表自己的见解,竭力追求和宣扬尽可能客观而公正的判断,下述言论便是诸多例证之一:

基督教学说的核心传统一直坚持认为,参与战争是情有可原的。我之所以说到这一“核心传统”,是因为我既不否认也不贬低各个时期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存在。但一般说来,基督教学说的传布者并未将基督的学说

决然解释为消除战争的学说。不过,他们为控制战争中的杀戮制订了严格的条件。譬如,倘若战争本身是不正义的——如果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话——那么,侵略者的所有杀戮都是不正义的。即便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士兵或政府都没有无限制的权利去杀戮敌方……从技术上讲,非作战人员都是‘无辜者’。有关战争的基督教道德的主要原则就是:有目的地杀戮无辜者等于谋杀……摧毁城市的行动总是不道德的。核武器的发明使得摧毁城市和杀戮非作战人员的行动更为容易了;但这丝毫不能使这种行动变得更为道德。使用核武器,如同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一样,都是邪恶的,不道德的,无论借此手段会取得什么样的优势。因为,此目的不能证明此手段的正当性。^①

在当时,教会内部意见出现分歧,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可以使用核武器,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国家,消除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使用核武器没有正当的理由。对此,当《天主教画报》(*Catholic Pictorial*)的常驻神学家利普雷神甫(Fr. Ripley)回应说,教会尚未在这两种意见之间做出抉择时,肯尼投书报刊,表示抗议。他说,

在大部分人看来,核战争意味着一场使用氢弹与原子弹来摧毁城市的战争。贵报的有些读者会从利普雷神甫的回应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战争在法律上是可以发动的。非也。战争中对没有参与战争的人进行有意的杀戮就是谋杀。这不是教会未作回答的问题。在1958年的复活节布道时,高德弗雷主教(Cardinal Dogfrey)说过:“没有人会赞同这样的论点——使用任意破坏的核武器去轰炸主要以平民组成的人口中心在道德

^① Anthony Kenny, *A Path from Rome*, pp. 170-171.

上是合法的。”因此可以说,使用核武器总是不道德的,就像用其轰炸广岛与长崎一样。无论用核武器轰炸任何人,不管是日本人、俄国人、基督教徒或共产党人,都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国家的神学家尽管在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上的确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使用核武器——即便在可能使用的唯一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①

最后,令人颇为感慨的是,肯尼在 1963 年还俗之后,教会仍为他保留教籍,期待其还俗失败,“迷途知返”。按照教会原有规定,也就是僧侣的立誓不婚律条(the law of celibacy),肯尼本人不可结婚成家。但他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有幸结识了来自美国宾州的南希·盖雷(Nancy Caroline Gayley),两人相互倾慕,随之坠入爱河,于 1966 年 4 月喜结良缘。为此,他自己被开除教籍,逐出教会,算是彻底还俗,与教会切断了所有关系。不过,这并未影响肯尼继续定期参加教堂礼拜活动——主要是英国国教而非天主教的礼拜活动。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激发自己的信仰,而是出于一位不可知论者的思想需要,因此从不接受任何布道,也不背诵任何教义。不过,他所说的不可知论,不是必然型不可知论,而是偶然型不可知论。这样的不可知论者会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但上帝也许会被人所知;我没有证据表明上帝不能被人所知。”可见,这种偶然型不可知论,是一种永不安生的不可知论,所追求的是真知灼见而非不确定性。因此,肯尼一直关注宗教哲学,关注自然神学的现状,关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②

肯尼这位偶然型不可知论者(contingent agnostic),对于理性之德与信仰之德均有独到的见解,对于轻信说与怀疑论均有深刻的批评。当他对教条教义所制约的宗教信仰产生疑虑之时,在他最终离开教会返还俗世之后,他并没有

^① Anthony Kenny, *A Path from Rome*, pp. 171 – 172.

^② Ibid., p. 208.